

海合会

成员偏好对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韦进深 符春苗

摘要：成员偏好是影响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变量之一。根据行为目的的不同，成员偏好类型可以分为风险规避型和效益优先型。不同的偏好类型对制度演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海合会的历史上，风险规避与效益优先构成了影响一体化的矛盾关系。基于风险规避的偏好，海合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排他性，对组织规模的扩大极为审慎，而基于效益优先的偏好，海合会在经济一体化程度上不断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成员偏好；风险规避；效益优先；海合会；经济一体化

作者简介：韦进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10级博士生（上海 200083）；符春苗，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人员集训部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2010级博士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1-0069-13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作为极具中东区域特色的一体化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称海合会）的成立和发展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解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出现和发展时，学者们多遵循两条研究路径：路径一，以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寻找一体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试图构建一种解释一体化的宏理论，其中以卡尔·多伊奇的沟通理论、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厄恩斯特·约瑟夫·奈等的新功能主义解释为主要代表；^①路径二，则关注各地区一

^① 参见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一体化的差异性，试图寻找导致一体化差异的影响因素。具体到海湾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即海湾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包括地缘政治、安全威胁、经济发展需求等；内部条件则包括相同和相似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乃至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①这些解释对于我们认识中东地区一体化不无裨益。需要指出的是，路径一由于试图建立一种因果联系的宏理论，排除了影响各地区经济一体化差异的干预变量，往往难以解释理论和现实的差异问题。路径二由于涉及变量众多，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成员偏好出发，试图对海合会一体化的成因、发展加以解释。因为外部环境有利于使地区内的国家产生共同的需求。而相同或相似的内部条件则产生共同的价值，价值促使国家对需求进行排序，从而形成国家根据价值对需求进行排序的独特心理倾向，即偏好。在政治学理论中，制度的形成、运作、变迁乃至终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的偏好及其变化。

在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效益优先和风险规避两种不同的基本偏好类型对海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八十年代初，海湾地区阿拉伯君主国面临地缘政治的剧烈变迁和共同的安全威胁，产生了一体化的现实需求。而相同或相似的内部条件使这些国家具有共同的价值，因而形成了共同的偏好。成员偏好不仅决定了这些国家在一体化的制度设计、组织架构、议题设置和执行等方面达成一致，而且决定了海湾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1981年5月，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巴林、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六国元首签署合作委员会章程，正式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University press,1957; 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1975; J.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 Little Brown, 1971.

① 参见刘竞、安维华主编：《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万里、杨明星：《海合会一体化进程中的优势与困境》，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杨建荣：《阿拉伯海湾国家经济一体化及面临的挑战》，载《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周华：《伊朗与海合会成员国关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5期。

会，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CC）。此后，海合会历经 30 多年的发展与考验，一体化水平不断向纵深发展，推动了海湾地区的联合，成为阿拉伯地区一体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组织，并打破了美国学者“中东地区千差万别，不可能实现一体化”^①的预言。

与欧盟、东盟等其他地区一体化组织不同，海合会的一体化发展极富特色。按照一体化理论，经济体内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互补性强是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扩员则成为经济体扩大规模效应、进行经济整合、推动共同体内成员国之间充分发展的基础。以欧盟、东盟这两个一体化组织为例，欧盟历史上先后进行了六次扩员，其中最近的两次东扩是具有明显异质性质的扩员，新入盟的中东欧成员在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老成员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为欧盟内部成员国的自我调整、相互支持和加强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又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东盟自成立之后，也进行了数次扩员，目前已发展成为总面积 444 万平方公里、囊括除东帝汶以外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人口 5.76 亿、国内生产总值（GDP）近 2 万亿美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

根据这一逻辑，实现扩员应是海合会摆脱严重依赖单一石油经济，提高产业结构互补性，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一方面，海合会自成立以来，成员国以石油战略为依托，不断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深入发展。1983 年 3 月，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1999 年 11 月，六国元首就成员国之间统一关税达成协议，2003 年 1 月，海合会成员国提前两年正式建立和启动关税同盟，对内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对外则统一关税和实行统一的贸易和关税规则。2009 年，海合会国家领导人宣布海湾货币联盟进入实施阶段，为未来建立海湾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向着“加强成员国之间在一切领域内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以实现他们的统一”的目标大胆前行；另一方面，海合会自成立之初，即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其成员资格不仅严格限定在海湾地区国家，并且限定在该地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海合会成立 30 多年来，成员数目曾长期保持不变，一直是成立之初的海湾六国。直到 2011 年，海合会进行了成立 30 年来的首次“扩员”，决定接纳约旦和摩洛哥成为会员国。其中，由于约旦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约旦将成为海合会正式成员。而摩洛哥加入海合会后只

① Werner Fled, *Comparative Regional System*, New York: Pergamum Press, 1980, p.295.

是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并非是正式成员国。^①历史上，同为海湾地区国家的也门、伊拉克和伊朗则被海合会长期拒之门外。海合会这种经济合作大步向前、扩员问题上小心谨慎的地区一体化特点对一体化相关理论的解释能力构成了挑战。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海合会成员国在地区合作的进程中选择了一条不断提高合作水平而非扩员的“中东风”的一体化发展道路？在高度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这一因素又将会对海合会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既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合作是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一种基本形态。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面临着许多靠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各国希望通过合作解决问题并取得满意的效果。需求产生了合作，而由于合作带来的收益大于个体行动带来的收益，这成为一体化发展的动因。在一体化理论中，沟通理论和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就一体化的定义、动因、进程和实践等问题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多伊奇为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进行研究，多伊奇强调沟通模式和交往量的重要作用。关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多伊奇认为要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进一步增加各国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活动的数量，尤其是那些“以经济增长为表现形式、与获利预期和实际收益相关的活动。”^②在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中，沟通模式和交往量成为影响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变量。

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为理解一体化和合作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米特兰尼认为，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学习，日渐增强的信任将取代相互猜疑。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且这种信任能够延伸到还没有开始一体化的领域。米特兰尼强调的重点是特定领域一体化向其他领域的扩展（ramification）。米特兰尼相信国家之间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而在某一功能领域进行的合作，将会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或者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③

① 新华网：“巴林称海合会扩员不针对伊朗”，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18/c_121431892.htm。

②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5.

③ 米特兰尼的相关思想参见 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David Mitrany, “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 Federal or Functional?” in J. S.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以厄恩斯特·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则强调政党和利益集团在一体化中的作用，尤其关注这些单位中政治精英在一体化中的态度。哈斯认为，一体化得以推进与有关精英在政府部门所做的努力密切相关。基于实际的考虑，政治精英选择支持或反对一体化。如果政治精英确信可以从某一超国家组织的活动中获得好处，他们就可能与国外持相同观点的同行进行跨国合作。在此基础上，哈斯提出了“外溢”（spillover）这一重要概念。“最初在一个领域进行一体化的决策外溢到新的功能领域，一体化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官僚机构之间的接触和磋商越来越多，以便解决那些有一体化初期达成的妥协而带来的问题。”^①因此，在哈斯看来，特定领域一体化向其他领域的外溢与一体化的进程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在米特兰尼和哈斯理论的基础上，约瑟夫·奈提出了一体化的新功能主义解释的七个过程机制，即功能主义的任务联系，或外溢概念；交往的增多；有意的联系和联盟的形成；精英社会化；地区性组织的形成；意识形态和认同的吸引力以及外部行为体的参与。过程机制的刺激产生了一体化发展的条件，即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体化潜力（integrative potential）^②，以及一体化进程的四个特征，即政治化（politicization）、再分配（redistribution）、选择方案的重新调整（redistribution of alternatives）和外向化（externalization）。其中，后两种特征分别关注了决策者在一体化选择方案上所面临的问题和一体化成员共同立场问题。

沟通理论和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在解释一体化的产生、一体化发展的动因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这些理论提出的目的在于为世界上地区一体化进程提供一种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进而在宏观上为从整体上解释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但在某些具体的微观层面，则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如在一体化进程的具体方案选择方面，以欧盟一体化为例，欧盟组织内部成员国在“扩展还是深化”上曾面临分歧，在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欧洲中央银行和推行单一货币（欧元）的过程中，英国主张欧盟一体化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展先于深化”。因为，如果先建立货币联盟，中东欧国家加入欧洲一体化就必须达到单一货币标准，从而提高了中东欧国家加入的“门槛”；而欧洲大陆国家并不急于推进欧盟东扩，因为“只有对欧盟共同农业政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页。

② J.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转引自《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56页。

策、地区投资和决策程序等进行一系列困难和痛苦的改革之后，欧盟东扩才能辅助实施。”^①回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沟通理论和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对于解释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发展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在解释为何海合会成员国选择不断提升一体化的程度，而不是扩员的问题上，上述理论的解释力则相对薄弱。这导致了在具体的一体化方案选择问题上众说纷纭，很难有一个被大众接受的解释。

三、风险规避与效益优先：成员偏好的分析框架

沟通理论和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一体化的出现、发展，但这些理论都存在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一体化过程的本身，而对一体化的模式选择（或称方案选择）则较少给予重视的缺陷。由于一体化合作必然是在分散性、缺乏有效制度和规范约束的背景下进行。另外，合作多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是不同社会制度而又具有平等主权的国家间进行，因此，要进行合作，做出被各方接受的一体化模式选择，必须充分了解成员国的动机和意图，克服因为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问题。然而，早期的一体化理论多从一体化本身出发，强调一体化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汇聚成员预期、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推动国际合作进行的重要作用，其目的在于回答“一体化何以出现”、“一体化何以重要”的问题，而对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体化方案，而不是那样的一体化方案”则缺乏必要的理论解释。从研究设计的途径观察，一体化理论的解释试图找寻一种一体化解释的因果关系。在这些解释中，沟通外溢和交往量、扩展或外溢是自变量，一体化进程是因变量。与一体化理论密切相关的国际制度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国际制度对成员国的重要作用。如奥兰·扬认为，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国际机制是人类互动的结果，是利益相关的行为体的预期趋于一致的产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机制概念试图改进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在国际制度理论看来，国际制度的存在，有助于汇聚行为体预期，改变成员偏好，从而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②

在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看来，成员的偏好是被假定不变的。在一体

①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 565 页。

② 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化理论中，其假定成员合作的偏好是一体化产生的关键。而在国际制度理论中，即使成员的偏好有所不同，国际制度的存在也会使成员偏好趋于一致。按照这一假定，国际社会一体化模式应该是相同或者相似的。然而，国际社会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的现实却与此恰恰相反。各种已有的地区一体化不仅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一体化的模式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成员偏好对一体化的进程存在影响，甚至在一体化的模式选择中有决定性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主要考察成员偏好对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影响。

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国际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国家不同的决策偏好。所谓偏好，指的是对决策类型的倾向性。如一体化，同为原苏东阵营的成员，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选择了加入欧盟这一一体化程度极高的组织。而在中亚地区，中亚各国对一体化的态度则各不相同，虽然中亚地区也存在大量的一体化模式，但至今仍未有一个具有主导型的一体化模式出现。其中，不同的成员偏好对中亚区域一体化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博弈论中，决策偏好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效益优先型偏好和风险规避型偏好。效益优先型偏好借鉴了经济学理论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是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①因此，在一一体化的模式选择中，成员的行为遵循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原则而非集体利益最大化决策行为的原则。然而，如果在一一体化模式中存在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设计，同时协调了个体利益最大化和集体利益的冲突，这样的一体化模式将会受到成员国的欢迎。提高一体化的程度和扩大一体化的范围是两种最为常见的一体化备选方案。对地区内的国家来说，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够满足成员国追求效益占优的偏好，因此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态度是积极的，会选择正向参与一体化，即选择加入、赞同深化一体化的程度或扩大一体化的范围。在此情况下，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实现帕累托效率最优。风险规避是决策偏好的另一个基本类型。如果追求效益优先的决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较大风险时，人们一般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决策，如在投资领域，以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为例，如果追求利益最大化，选择投资股票将是最优的决策（因为股票带来的利益比房地产大，但风险也比房地产大）。但如果考虑到风险因素，选择投资房地产而不是股票就是最优的决策。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有些成员国因为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选择了反向参与一体化，即选择游离于一

① 范如国、韩民春编著：《博弈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体化组织之外、反对深化一体化的程度或扩大一体化的范围。以海合会的经济一体化为例，海合会的成员国选择了不断提高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非扩员的方式，其依据正是成员国规避风险的偏好。

四、成员偏好对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到 20 世纪七十年代，海湾国家最终全部获得了独立，并逐渐掌握了本国经济命脉。石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海湾国家工业经济的转型，并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石油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中心地位的原料出口收入，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经济来源中最重要的部分。”^①海合会成立前的 1980 年，石油收入已经占到各成员国 GDP 的 55% 以上。^②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构成了海湾国家联合抵御风险的动因。作为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中东地区 20 世纪五十~七十年代局势的动荡对海湾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52 年，埃及法鲁克政权瓦解；1958 年，伊拉克费萨尔政权垮台；1969 年，利比亚伊德里斯政权被推翻。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君主国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1979 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加剧了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的危机感。在此背景下，依靠共同的力量来对抗共同的威胁，“捍卫共同的信念及价值观”的理念推动了海湾国家的联合。

回顾海合会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海合会成员国效益优先和风险规避的偏好对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海合会成员在一体化的模式选择上。仅从经济学上讲，区域一体化一般发生在地理相邻的国家之间，目标是促进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自由流动，以充分利用各个成员国的优势，提高分工和协作的效率，实现区域一体化中的双赢和共赢。一体化组织的成员通过制定统一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财政与金融政策等，消除国别之间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障碍，从而有助于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地区成员来说，正向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并且不断提升一体化的水平，将是最优的选择。海合会成立后发展的历程佐证了这一理论。1981 年 11 月，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了《经济一体化协议》，制定了经济一体化的目标。1994 年，海合会财政合作委员会会

① F. Gregory Gause, *Oil Monarchies: Domest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4, p.47.

② IMF, *Govern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1*, Washington D.C., IMF, 1992, pp.480-481.

议决定分阶段逐步实现统一税制。同年 12 月，海合会财长会议决定在成员国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并讨论了统一关税问题。进入 21 世纪，海合会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速度，向实现真正货币联盟的高级经济一体化目标前进。2003 年，海合会六国关税同盟正式开始运作；2008 年，海湾共同市场正式启动；2009 年，海合会首脑会议正式通过海湾货币联盟协议；2011 年 5 月，海合会国家财长会议称将在 2015 年建成真正的货币联盟。

但是，海合会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单一的经济结构。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是在任何地理上邻近的经济实体之间都能够无条件地发生。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互补是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对海合会成员国来说，海湾国家对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高度依赖，成员国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相同或相似，互补性差，因此成员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并不高。按照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国际上的实践，扩展一体化的范围，吸收地区内具有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互补的国家加入一体化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其他地区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等，都经历过“扩员”的过程。然而，如果说海合会成员国在不断深化合作、提高一体化水平方面持积极甚至“激进”态度的话，在扩展一体化范围的“扩员”问题上，相关国家则极为审慎甚至保守。直到 2011 年，约旦作为海合会正式成员加入，海合会才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扩员”。这表明，在“扩员”问题上，海合会成员国并非依照效益优先的偏好行事。规避风险成了海合会成员国加以考虑的首要原因。

在海合会成立之初，它是作为一个政治安全组织出现的。在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中，规避政治和安全风险给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消极影响成了海合会成员国必须加以重视的因素。而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安全形势，也进一步强化了海合会成员国风险规避的偏好，促使其在海合会扩员的问题上审慎对待。以也门为例，海合会成立之前，南北也门就表达了加入海合会的意愿，但最终被海合会拒之门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南北也门都是共和制政体，其中南也门与苏联关系密切，并作为中东地区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而长期存在。对海合会来说，其建立后的首要关切是维护海湾君主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南北也门如果加入，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对海湾国家的君主政体和意识形态构成严重挑战。因此，为了规避南北也门加入后对海合会一体化发展带来政治挑战的风险，海合会最终将也门拒之门外。直到 2001 年，也门才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海合会的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的部长理事会，但直到今天，其海合会观

察员的身份仍未发生任何变化。

海合会成员规避风险的偏好还表现在将海湾地区同为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和同为伊斯兰国家的伊朗拒之门外。从决策层来看，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决策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①伊拉克和伊朗也概莫能外，和海合会成员国在决策层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尤其是伊拉克，可以说符合了海合会成员要求的大多数特征，但由于伊拉克自复兴社会党统治以来，将集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一体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指导思想，并且一直试图谋求中东地区霸主的地位，这对极其保守的海湾君主国构成了严峻挑战。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并且向中东地区输出革命，支持和援助海湾地区的伊斯兰组织和团体，向海湾国家的什叶派提供物质和军事援助。此外，伊朗的波斯民族属性以及历史上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历史恩怨，也是海合会阿拉伯国家无法忽视的因素。因此伊朗也被海合会成员视为政治和安全的威胁。由此，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的现实考虑，海合会成员国规避风险的偏好进一步加强。海合会提高了准入的“门槛”，其成员资格不仅被限定在海湾地区，并且被限定在地区内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君主制国家。由于海合会成员国不仅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和宗教信仰，而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因此，海合会成为一个典型的排他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

海合会成员不仅在准入门槛的问题上聚合了成员偏好，而且在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的机制设计中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成员之间因偏好差异而对一体化产生的潜在影响。海合会的主要机构包括了最高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和秘书处。作为海合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理事会由成员国元首组成，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会议，各成员国按国名的阿拉伯字母顺序轮流主办会议，并由该国元首担任轮值主席。部长理事会与最高理事会保持一致，根据最高理事会的指示做出具体部署，并交由秘书处或下设委员会实施。表决是海合会决策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决议中，海合会最高理事会和部长理事会的表决采取一致同意的规则，即各成员国享有平等的表决权，一国一票。因此海合会有关实质性的问题必须得到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方能生效。这与欧盟的表决机制有很大不同，欧盟理事会成立之初，倾向于尽可能采取“一致通过”表决机制，但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和成员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已经成为欧盟理事

^① Shahid Jamal Ansari,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Gulf*, New Delhi: Northern Book Center, 1998, p.90.

会的主要表决机制。然而，虽然决策过程中使用多数同意的原则将更加高效、更加公平，但对海合会来说，采取“一致通过”的表决机制，能够促使成员国保持沟通和协商，协调彼此的立场，以促使协议的达成。由于每个成员国都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力，这就要求海合会成员国在成员偏好产生分歧的情况下，各成员国必须认真考虑其他成员的偏好和意愿。因此，海合会的决议，可以视作各成员国一致的偏好，从而避免了因为偏好的差异而带来一体化发展僵化的风险。

五、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景

海合会一体化发展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仅仅从一体化理论自身去解释海湾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和模式选择时，不管是沟通理论还是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这表明，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和模式选择还有非经济条件的约束。在特定情况下，非经济条件的约束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成员偏好”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干预变量来解释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模式选择问题。从一体化理论和海合会三十多年的实践出发，并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偏好加以考量，可以预期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将在以下两个维度进行：

首先，海合会成员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向着“成员国之间在一切领域内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以实现他们的统一”的既定目标前进。与此同时，海合会将不断扩大与地区外主要贸易对象国或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弥补因为成员国之间因经济结构类同、互补性差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效益优先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内成员进行决策和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对地区内的国家来说，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能够满足成员国追求效益占优的偏好，因此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向的，经济一体化正向发展的基本方式包括深化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或扩大一体化的范围。但对海合会来说，基于规避风险的偏好，海湾国家选择了不断深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程度的方式。从路径上看，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双边自由贸易逐渐走向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并一步步由自贸区、关税同盟等低级的一体化合作形式向着建立共同市场和货币一体化的高级一体化形式前进。从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看，海合会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即开始推进货币一体化进程，而欧盟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得以实现货币一体化，这进一步证明了当经济一体化的

制度设计能够满足成员效益优先和风险规避等多种偏好时，产生的合力效应将是惊人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合会加快内部成员间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海合会与地区外的经济合作也在加快进行。早在1990年，海合会就启动了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进入21世纪，海合会与新加坡、土耳其、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已经签署了自贸区框架协议。目前，海合会加大了与主要贸易对象的自贸区建设步伐，与欧盟、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区谈判已进行了多轮。海合会希望通过与主要贸易对象建立自贸区，来消除成员内部因经济结构类同、出口产品互补性差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之，海合会通过以整体的方式进行自贸区谈判，以加强内部对外贸易集体磋商机制，推动海合会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①

其次，在扩员问题上，海合会将继续坚持小集团的排他性原则，审慎对待组织规模的扩大，从而提高组织的有效性。

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次区域组织，海合会具有明显的内向排他性特征。尽管目前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但其成立之初，却是一个政治安全组织。因此，联合抵御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带来的挑战，维护海湾国家的政体和社会稳定，一直是海合会的主要目标。海合会在很大程度上更关心海湾六国的内部利益，希望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规避因扩员而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海合会目前正式成员的身份属性看，同处海湾地区，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和宗教信仰，相同或相似的君主制政体、经济结构构成了海合会成员的共同特征。在海合会的历史上，海合会曾长期拒绝共和制的也门加入，直到2001年，也门才成为海合会的观察员。此外，伊拉克、伊朗等国更是被海合会拒之门外。直到2011年，海合会才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扩员，同为君主制国家的约旦获准加入。海合会国家相信，只有建立这种具有共同特征的小集团性质的俱乐部，才有可能使成员国在更多的议题上选择合作，而非对抗和分裂。

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认为，组织管理成本^②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也就是说集团越大，行为体数目越多，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就越大，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就越不可能。在表决程序的机制设计中，海合会采取的是“一

① 2004年，巴林与美国单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此事件曾一度使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前景黯淡，海合会也中断了以整体方式与美国的自贸区谈判。2008年，海合会虽就此事达成谅解，但决定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的自贸区谈判必须整体进行。

② 组织成本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为组织和管理生产活动发生的材料、人工、劳动资料等的耗费。

致通过”表决机制，如果成员数量增多，交易成本就会上升。因为组织内各成员在寻求解决方法时必须考虑相关利益攸关方的立场，那么问题会变得复杂而难以解决。海湾国家之所以在阿盟之外建立海合会这样一个次区域的组织，效率问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成员偏好决定了海合会在选择一体化发展模式上的态度。一方面，海合会成员国希望不断深化一体化的程度，来共同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另一方面，海合会成员国希望通过建立排他性的俱乐部，保持小集团的高效率，进而避免因为扩员带来的低效乃至僵化的风险。因此，在一体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选择不断深化成员间的一体化水平，由于聚合了海合会成员国效益优先和风险规避不同的偏好，而为各成员国所接受。而扩员虽然能够满足海合会成员效益优先的偏好，但同时却带来了风险。效益和风险偏好的矛盾，使海合会在扩员问题始终持保守而非积极的态度。所以，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海合会仍将继续坚持小集团的排他性原则，审慎对待组织规模的扩大。

Influences of Members' Preference on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GCC

WEI Jinshen & FU Chunmiao

Abstract Members' preference is one of the main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design of a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an action, members' preferenc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risk aversion and priority to interest. Different types of preference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the GCC, risk aversion and priority to interests have been in contradiction to influence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regard to risk aversion, the GCC was exclusive in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and prudent in expan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However, in view of priority to interest, the GCC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Members' Preference; Risk Aversion; Priority to Interest; GCC; Economic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余泳)